

全国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了。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也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的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表明国民党政权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告诫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如果我们只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而在工商业政策、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上犯了错误，同样也会使革命半途而废。为此，毛泽东重申党的各项土地政策，完善和发展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严肃纠正各种“左”倾错误，并适时提出“五一口号”，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炉火纯青、最为成熟、最为自如的时期。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① 这是公允之论。

毛泽东选择“主义”的三重维度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李维武

1918年至1920年，是毛泽东上下求索选择“主义”的时期。这一“主义”的选择过程，在1921年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得出了最后的结论。这次会议从元旦开始一连开了三天，所讨论的主题就是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主义”，以此来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导思想。会议讨论的问题和发言的内容，经毛泽东在这年春季整理，撰写并铅印成《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这次报告记录了该次会议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和会员围绕“主义”问题的辩论与选择。其中，毛泽东在会议第二天的发言尤其重要。他首先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主义”——“1. 社会政策；2. 社会民主主义；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 无政府主义”，进而分别予以评论、加以考量，得出结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② 中国历史的进程已经证明，毛泽东对“主义”的这一选择，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新民学会，以至对现代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深入理解毛泽东的这一历史性选择，对于正确评价他的历史功绩和影响有重要意义。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毛泽东在得出这个结论时，有哪些因素起了关键性作用呢？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无

①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5页。

②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这是19、20世纪之交以来的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所致,如旅美学者张灏说:“这种革命思潮,以激进的理想主义心态为基础,变成马列主义在五四后期进入中国的踏脚石,也形成中国共产主义散布的思想媒介……从这个观点我们也可以认识为何毛泽东的革命观念对30年代到70年代的人有这样的魅力和影响力。”^①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毛泽东本人的务实性格和民粹主义所致,如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说:“务实性和民粹主义使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入党。”^②还有学者认为,这是毛泽东亲历五四运动、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如丁祖豪等说:“毛泽东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转变发生在1918年到1921年间,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促使他完成了这一转变。”^③

这些不同看法当然各有其合理性,但都是从单一维度来说明毛泽东对于“主义”的选择,或重视心理因素,或强调性格因素,或力主学理因素,而没有看到这一选择的实现其实包含了多维度的因素。正是这些多维度的因素,共同促成毛泽东对于“主义”的选择,并使这一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长久的生命力。在这些维度中,最值得关注的有时代、实践和学理三种因素。

二、毛泽东选择“主义”的时代维度

时代因素在毛泽东对于“主义”的选择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所列举的五种“主义”,都是在当时中国思想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它们的代表人物都力主以自己所选择的“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并由此而展开了不同“主义”间的激烈论争。正是在这种思想竞争中,马克思主义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作为一大政治思潮在中国思想界崛起。毛泽东对这五种“主义”所作的比较和评论,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包含着深刻的时代内涵。

今天来看这五种“主义”,后四种“主义”的时代内涵都很清楚,唯有作为第一种“主义”的社会政策,其时代内涵显得较为模糊。在有关毛泽东的文献中,往往把社会政策解释为社会改良主义,但社会政策在当时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性主张,以及毛泽东何以要将社会政策置于五种“主义”之首来加以考量,都缺乏具体而明确的说明。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联系毛泽东在新年大会第一天会议上的发言来看。在这个发言中,他说明了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宗旨的思想背景,指出这一背景就在于中国思想界的近期分化:“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在这两派主张中,“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④这与他在第二天会议上所说的“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正相呼应。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所讲的社会政策实际上是指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社会改

① 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开放时代》1999年第1期。

② 布兰特利·沃马克:《从城市激进分子到农村革命家:20世纪20年代至1937年的毛泽东》,林育川、宋扬译,《现代哲学》2011年第5期。

③ 丁祖豪、郭庆堂、唐明贵、孟伟:《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④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页。

良主义。在1919年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梁启超和张东荪主要以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来鼓吹社会改良主义。他们的这些主张，受到了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并由此而引发了社会主义问题论战。因此，毛泽东在对于“主义”作出选择时，首先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进行选择，因而一开头即对社会政策加以评论和考量。

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毛泽东整理新年大会发言记录时的时代背景。当时，正值社会主义问题论战进入高潮。针对梁启超、张东荪一唱一和，曲解社会主义，鼓吹社会改良主义，李达写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发表在1921年5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李达把梁文的旨趣归纳为五个层次，其中第四层次即“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李文对社会政策的内涵及其局限性予以了细致剖析和尖锐批评，指出：“现社会中经济的组织，不外两个大原则，就是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两大原则就是现社会中万恶的根源，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把这两原则完全撤废。讲社会政策的大都不然，只主张借资本阶级的国家底立法，施行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梁任公正在欲实行资本主义却就提倡社会政策，在方法上已是南辕北辙。”^① 由于社会政策在当时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梁启超、张东荪之间重大分歧的焦点之一，其具体所指在当时的背景下十分清楚，所以毛泽东在整理新年大会发言记录时，没有对社会政策的时代内涵作更多说明。

可见，时代因素是毛泽东选择“主义”的重要维度。正是这一维度，使他对于“主义”的选择不仅立足于个人的思想探索，而且浓缩了时代的思想探索，从而深刻反映了时代精神和历史走向。

三、毛泽东选择“主义”的实践维度

毛泽东在少年时代至青年时代的求学过程中，深受湖湘学风的熏陶影响，形成了面向实际、重视实践的思想性格。这种思想性格，在他对“主义”的选择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对这五种“主义”进行评论和考量时，特别强调以实践的效果为衡量其合理性的尺度。如对于无政府主义和“罗素的主义”，他都以“永世做不到”为理由，不予以选择；对于“列宁的主义”，他则以“是可以预计效果的”，认为“最宜采用”。而他所强调的实践，不仅包括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而且还包括他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如他对社会民主主义议会道路的批评，就包含了他对自己参与发起湖南自治运动的反省与检讨。

1920年6月至10月间，毛泽东在领导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积极参与发动了湖南自治运动。对于这一运动，他抱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即在湖南建立一种能够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意志的新型民主政治。他说：“我们所主张所欢迎的，只在‘湘人自治’一语。不仅不愿被外省人来治，并且不愿被本省的少数特殊人来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这才叫做‘湘人自治’。”^② 为此，他与彭璜、龙兼公联名提出了《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他们提议的“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实是一个代表湖南广大民众的新型议会，与湖南主政者所控制的省议会是全然不同的。因此，毛泽东参与发动湖南自治运动，虽然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并没有联系，但却可以说是他试图通过议会道路改造中国的一次实践。

^①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0、68页。

^② 《“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524页。

但湖南自治运动的实际进程却背离了毛泽东的意愿。当时主政湖南的新督军谭延闿,坚持以他所掌握的省议会来起草湖南宪法,否定了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召开人民宪法会议的主张。这就使这一运动走入了歧途,实际上退化为谭延闿的工具。毛泽东由此陷入困境,于10月下旬愤然退出。

面对这一失败,毛泽东进行了认真反省与深刻检讨。这年11月25日,他给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一系列书信,阐发了自己的有关思考,其中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①12月,他主持编印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在一段按语中对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进行了总结,指出:“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他进而对新民学会会员政治方向的选择提出了建议:出国留学的会员,可选择“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留在国内的会员,对于“政治运动之认为最经济最有效者,如‘自治运动’‘普选运动’等,亦可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②这些都清楚表明,他断然否定了议会道路,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

可以说,只有从毛泽东参与湖南自治运动这一段亲身实践出发,才能深刻了解他何以如此重视当时在中国影响并不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并把批评的锋芒集中到议会道路上。这一批判表明,他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的内部分化开始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并由此选择了“列宁的主义”,而这种理解和选择正是以实践为基础的。

四、毛泽东选择“主义”的学理维度

毛泽东对于“主义”的选择,还有其学理上的根据,这就是他基本准确地掌握了唯物史观,并开始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中国的现实、探寻中国的出路。这一点,在他于新年大会前后所写的两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萧子升等旅法新民学会诸友的信中,对这年10月下旬罗素来长沙所作的讲演进行了批评,指出罗素用教育方法改良社会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空想性质的共产主义,因为现实世界的教育机关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他进而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家掌握教育的原因,指出了资本家正是依靠其经济基础以及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制度,来维系对教育的垄断。他说:“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他由此得出结论:“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③正是这样,在“罗素的主义”与“列宁的主义”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这些论述显示出他对唯物史观已有总体性的把握,

① 《致向警予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48页。

② 《“驱张”、“自治”与我们的根本主张》,《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71—572页。

③ 《致蔡和森等》,《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页。

并开始了联系中国实际的运用。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① 这一段话虽然简短，却分量极重，可以说代表了一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这一精辟的见解表明，他对“主义”的选择是以强调事实的唯物史观为其学理根据的。

毛泽东当时对唯物史观的了解和把握，不仅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献进行了认真研读，而且还在于以当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总体理论水平为其平台。在1919年至1920年短短两年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把握得到很大提升。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批介绍唯物史观的文章，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总体理解和基本把握。其中，李大钊更强调对经济基础特别是对生产力的重视，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其变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相互间的矛盾运动，并由此引发社会革命；而陈独秀则在肯定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更重视政治和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夺取和掌握国家机器，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目的。这些文章对于毛泽东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是十分重要的。他所说的“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字下”，就反映了陈独秀在唯物史观上对他的深刻影响。20多年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专门谈到了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对自己的启蒙意义，感慨地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②

五、简短的结论

毛泽东对于“主义”选择中的时代、实践、学理三重维度，在历史实际中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只是笔者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而分别加以考察。通过考察可以看出，他对“主义”的选择，有其时代的内涵、实践的尺度和学理的依据，是面对当时中国思想界诸多“主义”进行思想探索、实践衡量和多方面讨论的结果，不能简单归结为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所致，也不能归结为他的务实性格和民粹主义所致。否则，就难以解释这一现象：在新年大会上，属于激进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具有务实性格、民粹主义的社会政策，都没有为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最终认可。正如会员们在讨论中所说：“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波尔塞维克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③ 至于说毛泽东的这一选择是他亲历五四运动、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也存在着不够全面的地方。从实践维度看，这一说法忽视了参与湖南自治运动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而湖南自治运动并不属于五四运动的范围。从学理根据看，毛泽东那时还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当然也不存在接受或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因为那时辩证唯物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

① 《致蔡和森》，《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4页。

③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页。